

基于发生学与实践的传统村落时空演变过程及机制

——以重庆市为例

刘红梅¹ 王刚²¹

(1. 中南大学 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 湖南 长沙 410083;

2. 西南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 掌握传统村落时空演变过程与发生机制可为新时代村落保护提供参考。以发生学为视阈, 聚焦村落“事”的属性, 从实践出发, 结合GIS技术, 分析了重庆市168个国家级与市级传统村落的时空演变过程与发生机制。结果表明: (1) 实践是驱动村落演变的根源, 实践对村落演变具有显著的发生学效应, 实践的历史起伏引发村落阶段性发展: 起始期(先秦)“自发发展”, 波动期(秦汉至宋元)“波动增长”, 转折期(明)“显著提升”, 成熟期(清至民国)“格局奠定”。(2) 农耕实践、经济实践与政治实践是激发村落演变的主要实践, 分别推动生成农耕型、商贸型、军事型村落, 并发生转型, 其中农耕型位居主导, 农耕型转商贸型最为突出。(3) 村落随实践的空间演进与累积呈现从长江干流到渝东南山地推进, 从“多点分散”局部分布到“一核聚面”全域铺展, 最终形成“农东商西军冲要”格局。(4) 以实践目的为导向解析了村落时空演变的发生机制, 并提炼构建了“实践环境—元实践”逻辑结构, 得出村落是在受动与能动的对立统一中展开时空演变。结果启示传统村落保护需要适宜的实践环境、保持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 建议继续原生性实践, 融入创造性实践, 推动伦理性实践, 以使村落在延续地方性中保持活力与合理发展。

【关键词】: 传统村落 发生学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发生机制 元实践 重庆市

【中图分类号】: K90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227(2022)01-0059-14

传统村落作为古代“因聚族而居的生产生活所需”而形成的“基本社会单元”^[1], 承载着中国农耕文明的历史记忆, 维系着中华文化的根脉, 是“活”的民族文化遗产^[2]。自2012年住建部等国家三部委组织开展全国第一次传统村落摸底调查至今, 共公布了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单, 总计6819个; 住建部等部门在2014年印发了《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 随后各地纷纷出台了传统村落保护条例。以上行动的目的旨在延续传统村落, 落实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精神。然而,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迅速推进与村容村貌整治等措施的欠合理执行, 传统村落消逝与损毁的形势日益严峻, 加强保护迫在眉睫。但是如何保护好传统村落? 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 这都是一个难题。可以明确的是, 传统村落发演于历史时空之中, 保护传统村落有必要掌握其生成、发展的历史规律及其空间演变的内在机理。

近年来, 传统村落时空演变逐渐成为地理学、资源环境学、城乡规划学等学科的关注热点, 有较为丰硕的成果呈现。耙梳相

作者简介: 刘红梅(1986~), 女, 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聚落地理与村落文化. E-mail: greenhongmei@163.com

基金项目: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9SKGH285);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ZD191); 重庆市社科规划重大委托项目(2016ZDWT04); 重庆市教育科学规划重点有经费课题(2017-GX-051)

关文献后发现, 研究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 4 个方面: 一是演变特征。侧重运用 GIS 构建某个区域传统村落的地理信息数据库, 并借用其空间分析技术, 从总体上分析历史进程中传统村落的分布演变。如张慧等^[3]、梁步青等^[4]、李孜沫^[5]测度了各个历史时期相关区域村落的聚集程度、分布重心及新增村落分布等情况及其演进规律。二是影响因素。呈现两种研究方式, 一为选择多个主要因素分别探讨各因素对传统村落时空分布的作用, 此为研究主流, 如卢松等^[6]较为全面地分析了自然因素(地形、水文)和社会经济因素(人口、交通、城镇化、经济、政策)对徽州传统村落分布演变的影响; 二为选择一个关键因素深入剖析, 如陈蕊等^[7]、陈旭^[8]重点研究了道路演化对村落分布演变的作用。三是形成机制。在确定多个影响因素基础上, 分析各因素之间的关联及其如何驱动传统村落演变。李久林等^[9]将古徽州村落成因归纳为内部动力(文化、经济)与外部动力(自然、历史和社会)协同作用的结果。四是保护策略。基于传统村落时空演变规律及其影响因素提出保护建议。向远林等^[10]、李久林等^[11]提出基于资源本底, 开展分级分类保护、区域旅游协作与整体性保护等。

综观之, 现有相关研究总体围绕村落“物”的属性而展开, 即学者多将村落看作客观存在的外在于人的物体, 局限于从“物理”角度分析村落与自然与社会各种作用力下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实然的运动规律, 这种方式将人脱离了村落, 呈现人与村落主客二元的研究取向。人与村落割裂的研究方式, 无法从根本上提出村落保护的有效措施。孙根年^[12]主张, 我们应在“事—物—人”的相互作用中认识地理事物。对于村落而言, 先人后村, 人通过行事作用于客观世界, 并在行事的过程中产生和改变村落, “事”赋予了村落生长演化的活力, 由此, 村落也具有“事”的属性。村落“事”的属性不由自身开展, 而由人行事(即实践)以实现。“事”即人的实践, 实践的结果才表现为村落“物”的形态, 在“事”(实践)中, 人与村落的“物”性达成统一, 从而实践呈现更本源的意义^[13]。因而, 实践是人与村落建立关系的条件或中介, 抓住村落“事”的属性, 着眼人对村落的实践, 是连通人与村落, 实现主客统一的关键, 也是认识村落时空演变的根本路径。那么, 如何才能准确把握村落时空演变的本质? 对此, 发生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理念与方法。发生学以其强调把研究对象作为发展过程进行动态考察, 深究事物发展原理与机制, 以此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的特色, 广泛运用于自然与社会科学研究中, 其中实践是发生学领域中的重要视角。本文通过发生学与实践透视村落时空演变, 意义在于从聚焦村落“物”的属性的研究转向其“事”的属性, 通过关注人的实践及其发展对村落演进的作用过程与机制, 力图实现对村落时空演变本质的把握, 弥补以往研究囿于村落“物”的属性导致人村分离而无法深及村落时空演变本质的不足。

重庆作为“巴文化”发祥地之一, 自古具有农耕渔猎复合经济优势, 后逐渐发展为长江上游重要的商业物资集散地和区域性军事政治中心。由于扼守中国东西经济与文化走廊的交通要脉, 历代人口迁徙不断, 贸易往来不绝, 这些深远丰富的历史实践推动着村落演变不息。本文选择长江上游重庆市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 开展发生学与实践视阈下传统村落时空演变的过程与机制研究, 以期对新时代重庆市传统村落保护建言献策。

1 研究设计

1.1 理论与思路

发生学认为, 凡是时空之内存在的事物都涉及发生学问题^[14]。它始于 17 世纪的胚胎学, 最初用于探索生物的发生、发育过程, 继而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研究元素、生命、人类的起源与演化等问题。其后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对发生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其研究方法开始注重关联性、互动性和系统性。20 世纪 70 年代, 皮亚杰融合逻辑学、数学、物理学、心理学等剖析了儿童思维的成长过程, 以此考察人类思维的构建机制, 揭示认识论的发生原理, 其研究方法尤为重视对研究对象的动态性、结构性与逻辑性分析, 这一研究范式使发生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备受推崇^[14, 15, 16, 17]。发生学发展至今, 已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研究理念与方法, 即动态地考察研究对象, 系统、结构、逻辑地分析历史过程中影响研究对象发展的主要的、本质的、必然的因素, 以此反映和揭示各类事物发展、演化的历史阶段、形态、规律与原理^[18]。可见, 发生学这种力图寻找事物发展根据的理念, 实则在于把握事物演变的本质, 以此获得对事物本真的认识, 因而具有了方法论与认识论的统一性。相比简单地研究事物演变历程的方法, 发生学以其逻辑地寻根探因而达至事物本质认识的特质^[19]而凸显了其研究优势。

皮亚杰将认识论的发生学研究开端指向了实践^[17],推动了实践在人类社会发生、构成、变迁研究中的运用^[20]。从源流看,实践自古希腊就被提出,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将实践视为由观念与意志支配的政治、伦理活动,而认为经济等其他领域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对此承袭与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1],并把包括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看成人类实践的结果。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强调了人的生育繁衍这类人类自身的生产实践对人类文明演进的关键作用^[22]。据此,实践作为人的“类本质”,成为推动社会生活发生发展的根本方式。实践也因此成为揭示人类社会及其所创之物生成、演变的基点。

近几年,发生学已运用于传统村落的起源^[23]、空间形态演变轨迹与机制^[24]、保护对象的判别方法、空间拓展过程解析及保护策略等^[25,26]研究中,已显露出其对传统村落变迁过程、机理与保护等的研究价值,但结合实践,融入定量方法,解析传统村落时空演变的规律、机制与逻辑还尚未涉及。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活动,那么实践也是人类创造村落的一切活动。作为人类历史景观的传统村落,历经了不同时期实践的作用,负载了深厚的实践信息。从发生学与人类实践看,一个地域的传统村落时空演变是一个动态连续的系统现象,是以人的实践发展为脉络的演变过程,以实践为出发点研究某个地域的村落时空演变的发生学问题,有利于统一影响村落生成、转型与空间演进的事件与过程、历史与逻辑。本文依据发生学理念与方法,从实践出发,追溯重庆市传统村落时空演变的发生发展历程,从中考察影响村落演变的主要实践类型,并在时间与空间层面分别做发生学解释,进而从中发掘产生村落时空演变的发生机制与内在逻辑,以把握村落时空演变的本质,最后思考研究结果对新时代传统村落保护的启示。具体分析思路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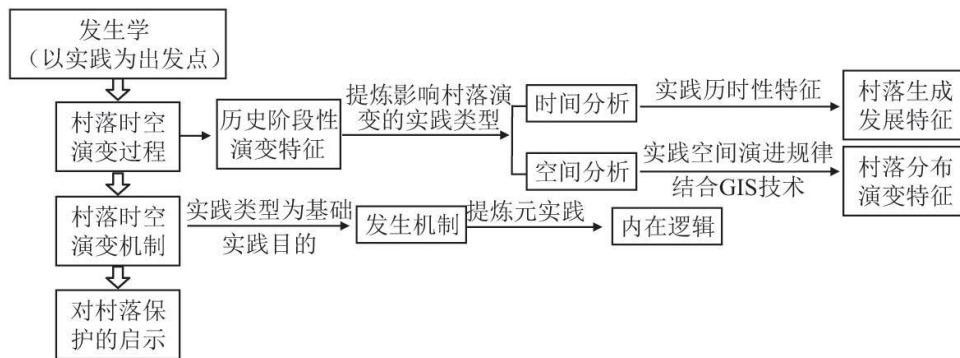


图1 分析思路

1.2 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地处长江上游,位川、黔、湘、鄂、陕五省交界处,幅员面积 $8.24 \times 10^4 \text{km}^2$ 。三面环山,长江自西向东贯流全境,地势由南、北、东向长江河谷逐级降低;地貌包括中山(海拔 1000~3500m)、低山(500~1000m)、丘陵、台地与平原(<500m)5 种类型,其中以丘陵、低山为主的地貌占市域面积 88.7%;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流域密布。按照国家住建部与重庆市住建委员会公布的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与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评选办法,截至 2019 年,全市共评定出 168 个国家级与市级传统村落,这些“样本”形成时间涵盖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代、清代、民国 7 个历史时期,在重庆市传统村落中具有代表性与珍稀性,是研究我国长江流域历史文化发展的“活态标本”(图 2)。

1.3 数据来源

(1)传统村落数据:国家级传统村落数据源自住建部网站(www.mohurd.gov.cn)获取的 5 批(2012~2019 年)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其中重庆市共 110 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数据源自住建部网站获取的 7 批(2003~2019 年)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名录,重庆市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23 个,名村 1 个;市级历史文化名镇数据源自重庆市政府网站(www.cq.gov.cn)、重庆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网站(ghzrzyj.cq.gov.cn)获取的4批(2002~2019年)市级历史文化名镇名录和2批(2017~2018年)市级历史文化名村名录,重庆市有市级历史文化名镇51个,名村45个。将历史文化名镇计入该镇所驻行政村,删除重复数值^[27],共获168个传统村落,借助百度地图获取每个传统村落的地理位置,使用ArcGIS10.2平台构建重庆市传统村落地理信息数据库。(2)DEM数据(分辨率30m):源自中国科学院数据云中心网站(www.csd.cn)。(3)矢量地图数据:源自重庆市国土资源局,采用统一的坐标系(GCS_WGS_1984)作为时空分析地理底图。(4)村落概况及其形成、转型时期:通过查找文献、权威公布、实地调研等途径获取每个村落的基本情况;村落形成与转型时期参考了已有研究^[27],一是村落评定公布,二是文献记载,三是村落中现存最早的历史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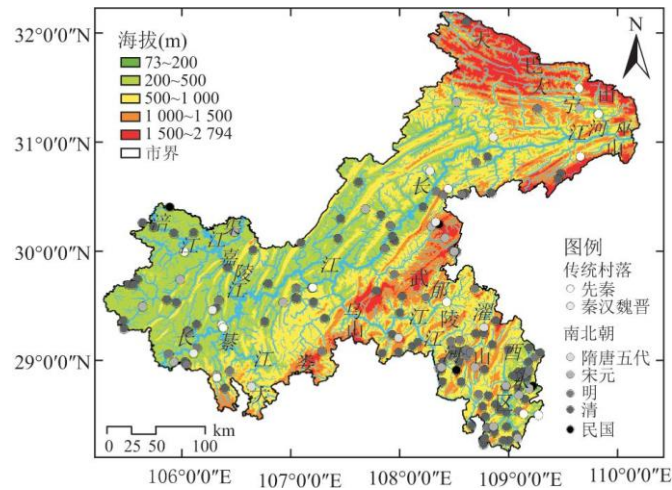


图2 重庆市传统村落形成时期与地理分布

1. 4GIS 空间分析方法

使用最近邻距离法与核密度估计法,借助GIS空间分析工具,以反映实践历史发展对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演变的发生学作用。

1.4.1 最近邻距离法(Nearest Neighbor Algorithm)

为掌握实践的历史累积对村落聚集程度的影响,使用该方法测度各历史阶段累计村落(本历史阶段新增村落与以往村落之和)在重庆地域范围内的集聚程度。借助ArcGIS的平均最近邻工具(Average Nearest Neighbor)进行计算,其公式^[6]为:

$$\bar{r}_E = \frac{1}{2\sqrt{n/A}} = \frac{1}{2\sqrt{D}} \quad (1)$$

式中: \bar{r}_E 为理论(预期)平均最近邻距离,是原假设传统村落完全随机分布中邻域间的平均距离; n 为各历史阶段重庆市传统村落总数; A 为重庆市市域面积; D 为传统村落密度。

$$R = \bar{r} / \bar{r}_E \quad (2)$$

式中: R 为最近邻点指数,为实际平均最近邻距离 \bar{r} 与理论平均最近邻距离 \bar{r}_E 之比。实际平均最近邻距离 \bar{r} 计算方法:

首先测量每个村落质心与其最近邻村落质心之间的直线距离，再计算所有最近邻距离的平均值。 $R>1$ ，表明传统村落为均匀分布； $R<1$ ，传统村落为集聚分布； $R=1$ ，传统村落为完全随机的分散分布。集聚程度需结合 Z 分数与 P 值判别：当 $|Z|<1.65$ ，且 $P>0.1$ 时，表明实际距离与理论距离无显著差异，接受原假设，否则接受备择假设。最后将各历史阶段 R 结果与实践做比照，得出实践历史累积与村落聚集程度的关联。

1.4.2 核密度估计法(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为掌握实践的历史累积及其空间演进对村落分布重心的影响，使用该方法分别计算各历史阶段累计村落与新增村落在重庆地域范围内的核密度值，并做可视化表达。以每个村落 $i(x, y)$ 的位置为中心，通过核密度估计函数计算每个村落指定范围内(半径为 h 的圆)各个网格单元的密度贡献值，距中心村落距离越近则密度越大，在搜索半径范围内密度逐渐减少至 0。对每个村落采用相同方法计算后，将相同位置处的密度值进行叠加，得到该村落在重庆地区的核密度值^[9]。运用 ArcGIS 的核密度分析工具(Kernel Density)进行计算，其表达式^[9]为：

$$f(x) = \frac{1}{nh} \sum_{i=1}^n k\left(\frac{x - X_i}{h}\right) \quad (3)$$

式中： $f(x)$ 为核密度估计函数式； n 为重庆市传统村落总数； h 为搜索半径(Search Radius, $h>0$)； $k()$ 为核函数； $(x-X_i)$ 表示估计村落 x 到样本村落 X_i 处的距离。核密度值最高的区域则是村落的分布重心。最后将各历史阶段核密度分布图与实践做比照，总结实践历史累积及其空间演进与村落分布重心的关联。

2 重庆市传统村落的时空演变过程分析

2.1 演变过程的历史阶段划分

本部分研究中，依据历史文献划分重庆市传统村落演变的历史阶段，同时结合 ArcGIS10.2 对各历史时期传统村落、流域做叠加分析与可视化表达(图 3)。

2.1.1 起始期(先秦 221B. C. 以前)

早在远古，重庆地区原始人类就依据水源等生存资源区位而确定居所。新石器时期，原始农耕推动了长江、嘉陵江沿岸原始村落的出现^[28]；同期，大宁河、郁江等流域就已开发盐业，形成了一批最早因盐业而生的聚落，以食盐交换粮食等生活资料的商贸型村落开始萌生，如存留至今的“川盐”重镇巫溪宁厂镇、彭水郁山镇等。随着商朝伐巴，大量巴人渐从鄂西迁入，沿郁江、乌江、长江拓展疆域，建都立国，繁衍生息^[29]，村落随之加增。本时期共留存 15 个村落(图 3a)。

2.1.2 波动期(秦汉至宋元 221B. C. ~1368 年)

秦灭巴国，在重庆地区置设巴郡，确立以户为生产单位的土地制度，推动长江支流大力开发，农业快速发展，村落由此增多。至魏晋南北朝，由于政权更迭频繁，“兵连战结”¹，巴郡“近为荒裔”“旷为长野”²，众多村落毁损荒废。这一时期村落在经历了增长与毁弃的起伏之后，总体增量偏少，只新增 6 个，累计 21 个(图 3b)。

隋唐时期，重庆地区社会较为安定，大量中原汉人因躲避战乱而迁入，带来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丘陵地区初步开发，僚人、巴人后裔等少数民族开始定居长江周边山地地区，此期广置州县，自唐代，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羁縻州县，推动区域进

一步开发^[30]。生产与交通的迅速发展，推动水码头、驿点小市等大量生长，并渐次衍变为村落或集镇。然而，唐后期及五代十国常年战乱，人口流亡衰减，许多村落毁弃萧条，致使保存至今的村落较少，共计6个，累计村落27个(图3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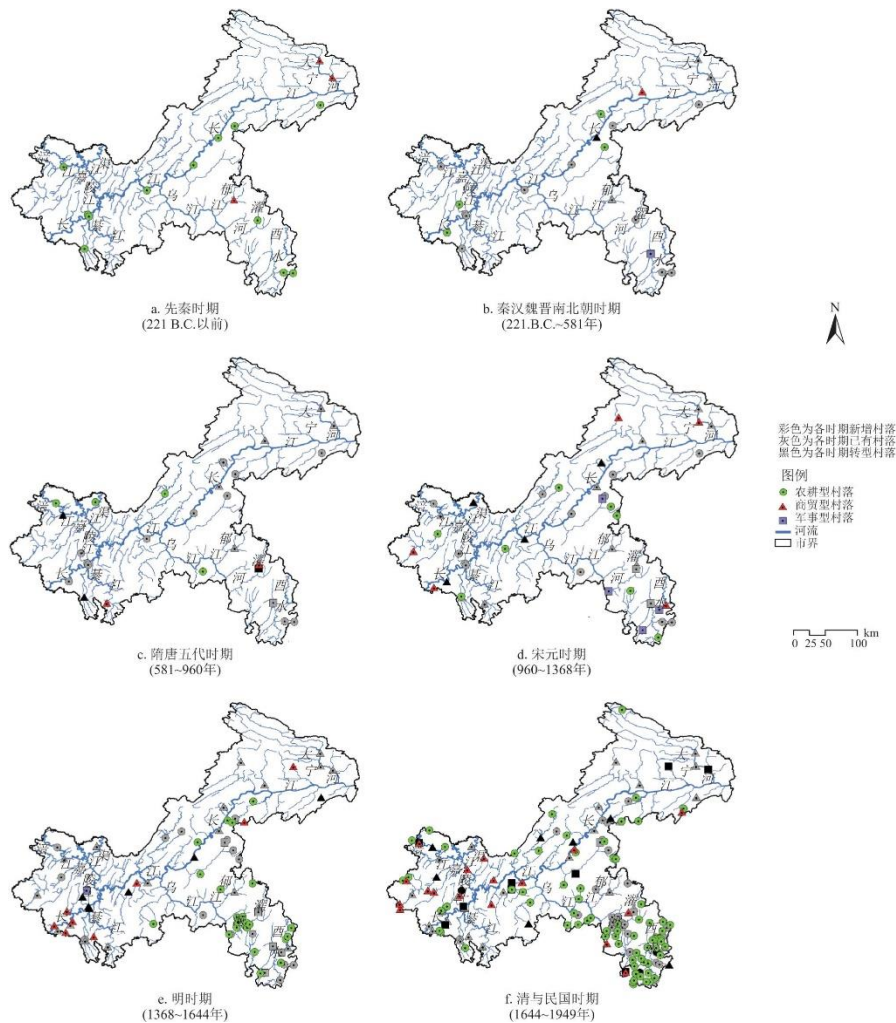


图3 重庆市传统村落历史演变与分布

宋代是古代重庆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商贸发达的长江沿线村落逐渐演变为城市，频繁的民族交往提升了少数民族的生产技术，丘陵与中低山梯田持续开垦，麻、桑遍种，纺织、井盐、瓷器等手工业进一步发展，村落一度兴盛。宋(蒙)元战争在巴蜀兵戈扰攘40余年，处于长江、嘉陵江等交通要道的村落大量陷入凋敝，众多川西人口流移至重庆边远山林垦殖、落户³。进入元朝，统治的加强与土司制的实行，推动一批军事型村落的产生。元末起义战火不已，村落又损。此期村落新增17个，总数累计44个(图3d)。

2.1.3 转折期(明 1368~1644 年)

明代，重庆战乱、灾疫频发，地荒人稀，严重制约了人口生产。大夏政权在重庆的建立，推动了数十万湖广等地民众迁入，许多移民途径三峡地区而举族落户，加之明初洪武移民、明中后期移民以及张献忠入川时驱动移民，使境内人口得以补充^[31]。玉米、红薯等高产旱地作物的传入，不少移民开始聚族定居于山地地区。随人口增多，农业开发进一步推进，内外贸易持续扩展，长江上游段与一些交通要地商贸型村落兴起。较之往期，村落数明显提升，新增32个，累计达76个(图3e)。

2.1.4 成熟期(清至民国 1644~1949 年)

明末清初,社会动乱,争战不息,加之灾疫连发,虎患复加,以致境内“丁户稀若晨星”⁴。自清顺治十年(1653年)起,清政府实施“湖广填四川”与经济振兴政策,鼓励移民垦殖与川民返乡,由此,重庆出现空前的移民大潮,人口陡增,农地大扩,“田种禾稻,山种杂粮,相资为用”⁵;政府引导广种经济作物茶、橘等,各类手工业渐兴,商品贸易需求日盛;许多支流、陆路渐次开发,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水陆交通网络^[32],从而刺激新生村落各地涌现,村落和住户密度明显提升,呈“结庐而处者踵相接衡相望”之现象^[33]。至清末,新增村落达 88 个,累计 164 个。

民国期间,重庆频繁陷入政局动荡和战乱难息的局势,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致使众多人口外徙内迁,加之耕地开发处于饱和状态,进而村落发展缓慢,仅新增 4 个。至此,重庆地区村落保存总量 168 个(图 3f)。

2.2 时间演变过程分析

(1) 3 种实践生成或转型为 3 类村落。

根据上述,农耕实践、经济实践与政治实践是促成村落之别的主要动因,而相应体现为农耕型、商贸型、军事型 3 类村落。纵观重庆实践史,农耕实践因最关涉人的生存需求、影响政权稳固而为各个时期的主流活动;经济实践是人在满足自给自足的基本生存之后对商品、服务的需求与行动,表现强度弱于前者;政治实践指奴隶制与封建制下,统治阶级为获取或巩固政权与利益而开展的各类活动,对前两种实践有显著影响,但从村落生成看,其中唯有军事活动对村落形成构成直接作用,如因防御、治理需要设置的军事重镇。因此,这 3 种实践生成的村落数量悬殊,分别为 125(占比总量 74.40%)、37(22.02%)和 6 个(3.57%)。

然而,村落类型并非一成不变,不同时期 3 种实践强度不一而使村落发生转型。从秦汉至民国,共计发生 36 个村落转型,其中以农耕型转商贸型最多(21 个, 58.33%),且在明清时期因经济实践繁盛尤显突出;转型数量逐期增强,民国最多(12 个, 33.33%),且有 9 个农耕型、商贸型村落转为军事型村落,原因在于民国时期重庆是抗战的重要区域,许多村落成为革命根据地(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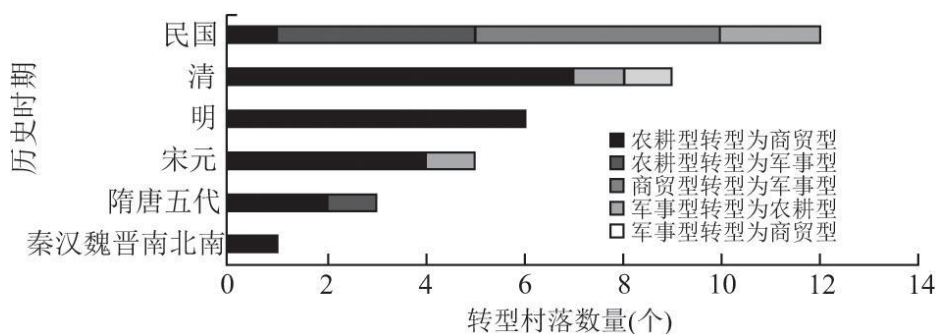


图 4 各历史时期村落转型统计

(2) 各时期主导实践决定了村落演变的起伏性。

先秦时期,商周与巴国的政治实践力度较弱,自由实践占据主导,人们较为自由地开发土地、食盐等资源,从而村落“自发发展”;秦汉至宋元,在重庆置设州郡,随之政治实践居于主导,村落随政治实践中的军事活动和各种制度干预而“波动增长”;明代,政治实践影响下和自愿自主的大量移民内迁带来村落数量“显著提升”;清至民国,政治实践影响下的移民浪潮与农耕实践的全面铺开而使村落大增,对当今重庆传统村落具有“格局奠定”作用。

(3)人口内迁、繁衍与生产劳动确保了村落发展的连续性。

重庆村落发展从未间断,虽然各时期都遭遇了战争或灾疫所致的损毁,但却未曾阻断人之流动、繁衍以及为谋取生存和保障人口延续而进行的生产劳动(含农业生产与商业生产),从而村落得以发展不息。人口是村落发展的根基,从重庆历代人口数量与村落数量的统计看(图 56),村落数量伴随各时期人口数的波动增长而保持递增(其中宋元时期二者呈负相关,原因在于宋元战乱导致人口减少,但村落数量却随后期移民迁入而继续增长),二者总体呈正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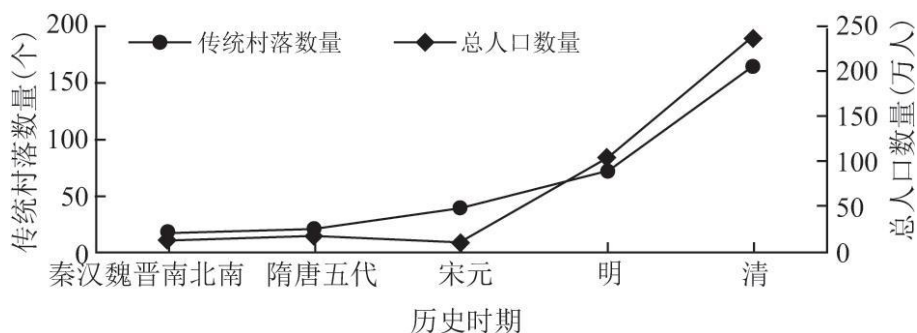


图 5 各历史时期人口数量与村落数量关系

2.3 空间演变过程分析

以上述 4 个历史演变阶段为基础,结合最近邻距离法、核密度估计法,对重庆市传统村落空间演变过程进行分析。首先,确定核密度分析中搜索半径 h 的设置,经参考相关研究^[9],以各历史阶段村落实际平均最近邻距离 r^{-i} 的平均值为依据,其中,各历史阶段的新增与累计村落实际平均最近邻距离使用 ArcGIS10.2 中平均最近邻工具分别计算而得,由于得出的平均值更适于呈现局部核密度值高的村落分布情况,为更好反映全域村落之间的空间关联,经多次测试,将 h 确定为平均值的 2 倍,即累计村落与新增村落核密度分析的 h 分别设置为 50、62km(表 2);其次,使用 ArcGIS10.2 的核密度分析工具,依次按照各历史阶段新增与累计村落输入相应 h 值,输出栅格像元大小设定为 100m,面积单位选择 km^2 ,处理范围为重庆市域,据此分别生成各历史阶段累计与新增村落核密度分布图,经汇总而得图 6、图 7。

表 2 重庆市各历史阶段传统村落平均最近邻距离

实际平均最近邻距离	新增村落实际平均最近邻距离(m)		累计村落实际平均最近邻距离(m)
	历史阶段	先秦	42416.3685
秦汉至宋元		37693.5078	26110.1803
明		28213.2083	18617.2842
清与民国		16389.1062	12040.6994
搜索半径 h 设置	平均值	31178.0477	24796.1331
	h : 平均值 $\times 2$	62356.0954	49592.2662

(1) 实践的历史累积驱动村落分布从“多点分散”渐变为“一核聚面”。

结合图 6, 先秦时期, 长江干流沿岸地势开阔、土壤沃腴, 大宁河、郁江流域盐泉丰裕, 且都兼具水运优势, 为农业耕作、人口繁衍与食盐开发等实践提供了条件, 在此首先形成了多个分散的村落“生长点”, 如巫溪—巫山、江津—九龙坡等; 秦汉至宋元, 长江南、北部丘陵和山地进一步开发, 村落在前期生长点基础上向四周拓展, 趋向连片分布; 至明代, 由于移民相继迁入并深入山区, 村落连片分布程度更高, 并在渝东南的彭水、黔江、酉阳、秀山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布重心; 到清与民国, 人口与生产力空前发展, 人的实践遍布全境, 新增村落与连同延续下来的过往村落呈“面”分布, 渝东南因人口陡增、战乱较少而成为村落分布核心, 最终形成“一核聚面”的格局。该特征与表 3 计算结果(各历史阶段累计村落最近邻指数 R 、 Z 分数与 P 值使用 ArcGIS10.2 中平均最近邻工具分别计算而得)一致: 从先秦至民国, 村落分布从分散转向聚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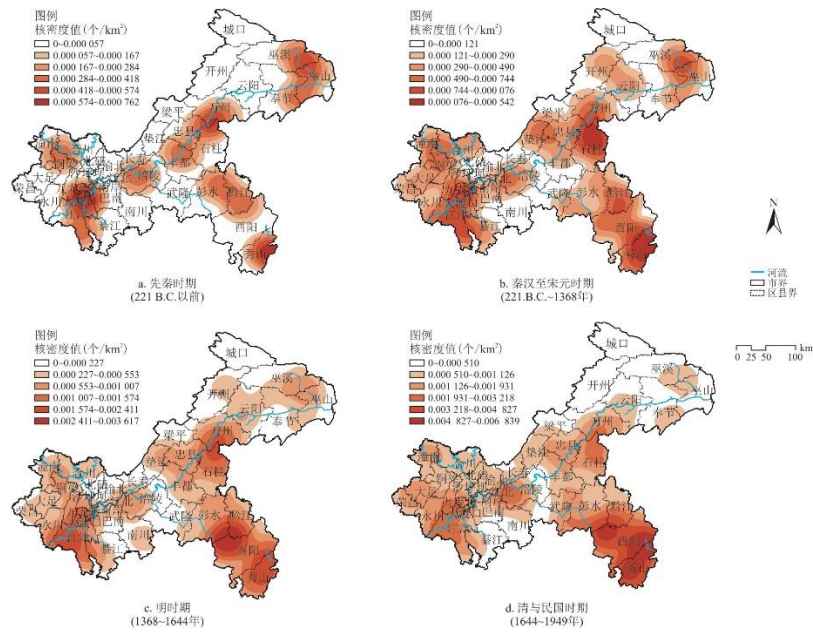


图 6 各历史阶段累计村落核密度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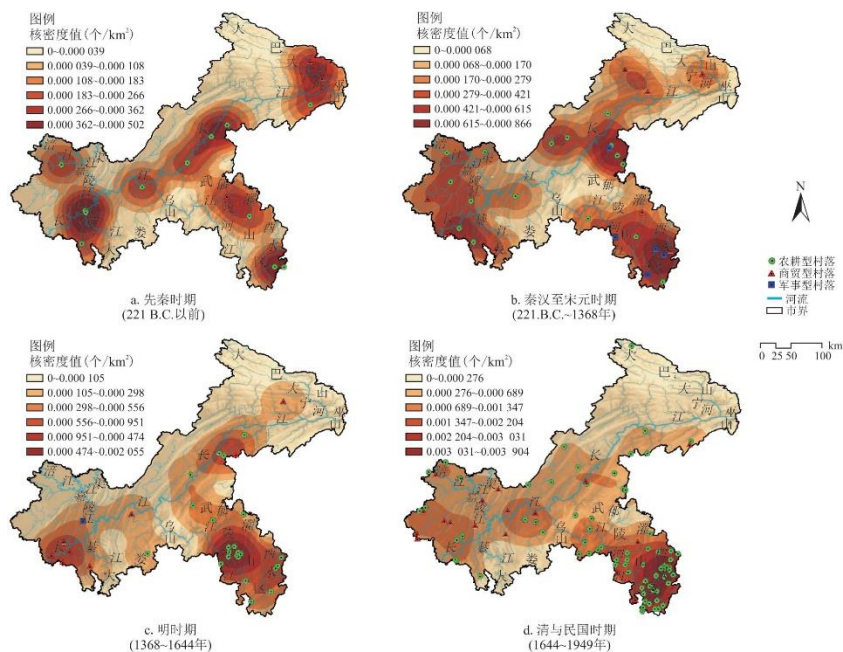


图 7 各历史阶段新增村落核密度分布

表 3 各历史阶段累计村落聚集程度

历史阶段	累计村落最近邻指数 R	Z 分数与 P 值	聚集程度
先秦	0.8403	Z=-1.1836, P=0.2366	分散
秦汉至宋元	0.8321	Z=-2.1308, P=0.0331	较聚集
明	0.7798	Z=-3.6732, P=0.0002	聚集
清与民国	0.6778	Z=-7.9898, P=0.0000	聚集

(2) 实践的空间演进促使村落依凭流域和地貌的条件依次逐级发展。

结合图 7, 总体看, 重庆历史实践空间演进根据资源条件从优到次、从易到难逐步展开, 而资源条件对实践的作用重点体现在流域、地貌两方面, 并推动村落分布相应演变: ①流域方面, 村落从一级流域渐次生长至二、三级流域。先秦时, 原始农耕与初级贸易推动村落沿长江、嘉陵江、大宁河等一级流域分布。随生产力提升、人口增长与交通拓展, 至清与民国, 82.75% 的新增村落分布于二、三级流域。②地貌方面, 村落从渝西、渝东北的平原、台地与丘陵逐渐推进至渝东南山地。自远古, 土地开垦、村落生成始于渝西、渝东北的长江干流流域的平原与台地。隋唐起, 受战争与移民政策影响, 中原、湖广等地移民陆续迁入并定居于丘陵与战乱较少的渝东南山地, 从而刺激此域村落大增。明代起, 渝东南成为新增村落密度最高地。可见, 新增村落分布随实践演进总体呈现从长江干流趋向渝东南山地的规律。

3 重庆市传统村落的时空演变发生机制与内在逻辑

3.1 发生机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4], 历史的目的则是人的目的, 人为实现目的而开展实践并形成历史。可见, 实践目的是探索村落演变原理的基础。基于此, 本文立足 3 种实践, 以实践目的为导向, 解析重庆传统村落时空演变的发生机制(图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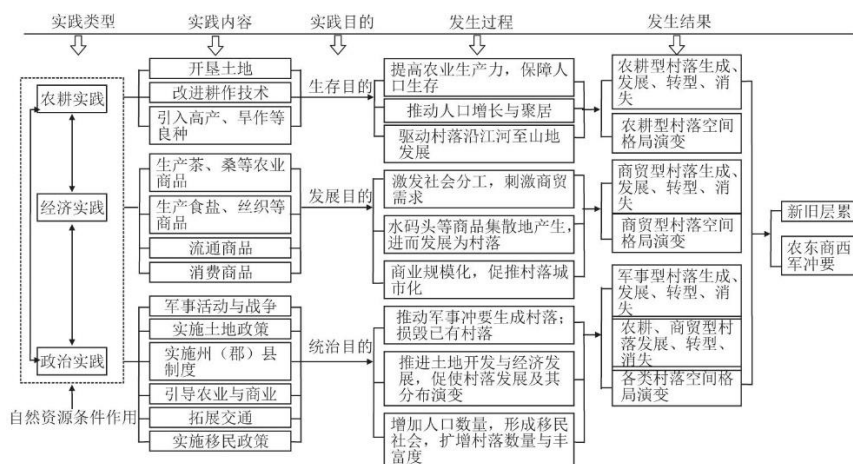


图 8 重庆市传统村落时空演变发生机制

(1) 农耕实践重在以人的生存为目的而驱动村落时空演变。“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中国历代重农，农业作为众业之本，是民之生存的根基。依靠农业而生存，进而因生存之需而聚居，无疑是推动农耕型村落产生的第一要因。先秦至民国，重庆人口在起伏中不断增长，生存之需迫使人口拓荒垦殖，引入良种，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提高生产力与确保粮食自足，从而保障人口在重庆定居繁衍，以此推动农耕型村落从长江沿岸向长江南、北拓展，最后趋近汇集东部。

(2) 经济实践重在以人的发展为目的而促发村落时空演变。人的生存获得保障后，继而产生发展的需求。经济实践在先秦已出现，春秋战国之际巴人已历了三次社会大分工，商业也已萌芽^[36]。秦汉以降，社会生产分工和农业商品化不断推进，因地势平坦、水陆交通便利，渝西经济实践逐渐活跃，推动水码头等商品集散地演化为商贸型村落。明清时期，商品生产、流通、消费显著发展，在继续产生商贸型村落的同时，也推动着农耕型转型为商贸型以及村落的城市化^[36]。因而商贸型村落渝西聚集的同时，也在逐渐消逝。

(3) 政治实践以统治阶级巩固政权为目的并影响农耕、经济实践而推进村落时空演变。古代，政治实践是统治阶级的专属，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统治。重庆在殷周时已进入阶级社会^[35]，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统治阶级采取了各种措施实施管辖，对村落演变产生重要影响的包括土地政策(从秦“黔首自实田”至清“摊丁入亩”)、移民政策(尤以明清“湖广填四川”为著)、道路拓展、农业与商业的示范引导等，这些措施的实现均需农耕、经济实践的开展，其结果之一就是村落的生成与演变。其中，政治实践驱动的军事村落主要分布于干流、边境之冲要。民国抗战期间，战争抑制了农耕与经济实践，长江干流等军事要道不少村落转型为军事型。

(4) 3 种实践交织互动，共同驱使村落“新旧层累”与形成“农东商西军冲要”格局。在重庆历史进程中，基于人的不同需求，3 种实践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形成了村落特定的发演时空条件。各时期村落通过生成、发展、转型、消失而表现出新旧共存，即“层累”现象。最终，重庆村落特定的历史情境中，经过各种实践的综合作用，总体形成了农耕型村落居东，商贸型处西，军事型位冲要，即“农东商西军冲要”的分布样态。

3.2 内在逻辑

根据发生学探究事物发展的根据，获取事物演变本质的理念，深入思考重庆村落演变过程与机制，可以发现：(1) 政治实践是人的行动与村落演变的必然“环境”。亚里士多德提出，“人类在本性上”是“一个政治动物”^[37]，说明人的实践必然具有政治属性。历史中，被统治阶级的农耕与经济实践强烈受到统治阶级政治实践的影响。从历史大众(被统治阶级)看，政治实践虽是一种行动，但从其影响程度而言，它已然构成了人的实践环境，即人的行动与行动作用下的村落演变是在政治实践(环境)干预下进行的。(2) 人口生产是实践开展的先决条件，也是村落形成的关键实践。“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38]，有人口的增殖方聚成村落。重庆人口生产包括移民迁入与人的生育繁衍，二者共同刺激人口增长，以及形成极富特征的移民社会与基于血缘而聚族而居的村落分布样态。(3) 物质生产是经济实践与农耕实践的基本形式，也是促动村落发展的根本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物质生产作为实践的首要内容，认为人类自产生并形成社会后，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39]。正是基于生产劳动，人与人、人与自然建立起紧密的实践关系，不仅为村落的发展提供动力，也为村落共同体的延续提供支撑。

据此，可以得出 2 个元实践——人口生产、物质生产，1 个实践环境——政治实践，及其相互关系(图 9)：人的自我生产与物质生产“受动”于政治实践(环境)，然而，人作为实践主体又具有能动性。透视重庆实践史可以发现，各历史时期政治环境下的实践任务都发挥了人自觉自主、有目的有计划地繁衍、流动与劳动。实践的受动性与能动性看似对立，却在人类实践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统一，村落则在历史实践的对立统一之中发生着时空演变。人口生产、物质生产、政治实践对村落发生发展的作用关联而形成的逻辑结构，构成了村落时空演变的本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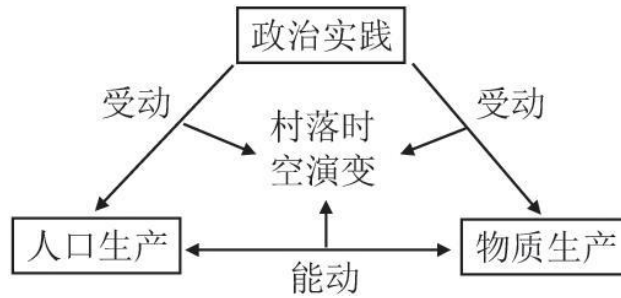


图9 传统村落时空演变的内在逻辑

4 结论与启示

实践是人与村落建立关系的根由，实践对村落时空演变研究具有本源意义。本文以发生学为视域，从实践出发，结合 GIS 空间分析技术，以重庆市 168 个国家级与市级传统村落为样本，解析了传统村落的时空演变过程与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1) 作为人的“类本质”，实践对村落的生成、发展及其分布演变具有显著的发生学效应。时间上，实践的历史起伏驱动村落波动发展，尽管历史动荡不定，但人们对生存和聚居的需求不变，从而在生产的推动下，村落发演不息；空间上，实践依据资源优次而逐级展开，并促发村落分布相应演变。

(2) 影响重庆村落时空演变的实践有农耕实践、经济实践与政治实践，3 种实践分别推动生成农耕型、商贸型、军事型村落，3 类村落随实践强度变化而发生转型；农耕实践居于历史主流，而使农耕型村落数量最多，经济实践逐渐增强，而使农耕型村落转为商贸型最为典型。反映历代重农的传统社会，农耕村落必然位居主导，而实现人之发展的实践目的也必然刺激商品生产及商贸型村落的产生。

(3) 重庆历史实践阶段性变动，村落由此而阶段性发展：起始期(先秦)“自发发展”——波动期(秦汉至宋元)“波动增长”——转折期(明)“显著提升”——成熟期(清至民国)“格局奠定”，其中使村落生与逝、兴与衰之间波幅最大的因素是政治实践中的移民与战争。对实践影响最显著的资源是水源与地貌，从长江干流到渝东南山地，实践难度逐步增大，村落随实践而“近水入山”，从“多点分散”局部分布到“一核聚面”全域铺展，最终渝东南成为分布重心。这表明实践的时空发展规律决定了村落时空演变的规律。

(4) 以生存、发展、统治目的为导向解析了重庆市传统村落时空演变的发生机制，3 种实践共同驱动村落演变、“新旧层累”与形成“农东商西军冲要”格局。进而提炼构建出村落时空演变的“实践环境——元实践”的逻辑结构：人的实践必然受动于政治实践，在此环境下，人能动地通过元实践(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推动村落持续发展。

村落通过历代实践的累积作用，如今已变成“传统”村落。知往可以鉴今，既然传统村落是历史实践的产物，则意味着可从影响村落演变的实践中获得新时代传统村落保护的启发。本研究结果揭示：传统村落保护需要(1)适宜的实践环境。如今村落已然摆脱了历史时期动荡不宁的发展环境，迎来了乡村振兴的时代机遇。(2)人口。有人口生产才有村落，既需留住本村人口，延续村落共同体，也需人口流入，解决村落空心凋敝困境。(3)物质生产。村落中人与人、人与自然实践关系的持续需以物质生产为基础。

进一步回答重庆乃至全国传统村落保护需要怎样的实践?(1)需要原生性实践，以延续地域特色。原生性实践指发挥人的能动性而自然形成的地方实践“习性”^[40]。重庆传统村落中原生性实践主要为农业耕作、食盐与纺织等商品生产及其流通等。原生

性实践延续,传统村落及地域特色也将延续。(2)需要创造性实践,以激发村落活力。在保持原生性实践的同时,也需融入创造性实践,全面利用资源,使传统村落在“相资为用”中“创新性发展”。(3)需要伦理性实践,以促进村落合理发展。马克思认为“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41],实践亦如此。历史实践在生成村落的同时也在摧毁村落(如战争),现时代在保护传统村落过程中也频现“建设性破坏”与“保护性破坏”现象,这意味着人的实践一直面临合理性问题,而这个问题必然关涉伦理道德。因而对于传统村落保护,除了制定与依据法规,也需激发与培养人的道德意向。总体而言,作为当今“文化孤本”的传统村落,其保护需要宏观(国家与社会)、微观(个体)层面的恰切的实践,一方面确保传统村落格局与地方性的维持,另一方面确保传统村落活态下去。

参考文献:

- [1]胡彬彬.小村落大文化[N].光明日报,2013-05-06(5).
- [2]张浩龙,陈静,周春山.中国传统村落研究评述与展望[J].城市规划,2017,41(4):74-80.
- [3]张慧,蔡佳祺,肖少英,等.太行山区传统村落时空分布及演变特征研究[J].城市规划,2020,44(8):90-97.
- [4]梁步青,肖大威,陶金,等.赣州客家传统村落分布的时空格局与演化[J].经济地理,2018,38(8):196-203.
- [5]李孜沫.汾河流域古村落的时空演化与形成机理[J].经济地理,2019,39(2):207-214,231.
- [6]卢松,张小军,张业臣.徽州传统村落的时空分布及其影响因素[J].地理科学,2018,38(10):1690-1698.
- [7]陈蕊,麻永洪,刘扬.不同时期交通因素作用下的滇西北传统村落时空分布格局演变[J].装饰,2020(6):81-85.
- [8]陈旭.井陘古驿道沿线村落空间演变及特征研究[D].北京建筑大学,2019.
- [9]李久林,储金龙,叶家珏,等.古徽州传统村落空间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J].经济地理,2018,38(12):153-165.
- [10]向远林,曹明明,闫芳,等.陕西传统村落的时空特征及其保护策略[J].城市发展研究,2019,26(12):27-32.
- [11]李久林,储金龙,李瑶.古徽州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及保护发展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0(10):101-109.
- [12]孙根年.事-物-人“三理和谐”与复杂地理问题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1):13-16,62.
- [13]杨国荣.基于“事”的世界[J].哲学研究,2016(11):76-84,129.
- [14]张乃和.发生学方法与历史研究[J].史学集刊,2007(5):43-50.
- [15]楼培敏.发生学方法[J].社会科学,1986(10):68-69.
- [16]郝玉明.发生学方法与道德起源问题研究[J].理论月刊,2016(11):43-48.
- [17]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M].王宪钊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 [18]金炳华等. 哲学大辞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1:318.
- [19]汪晓云. 人文科学发生学: 意义、方法与问题[N]. 光明日报, 2005-01-11.
- [20]朱炳祥. 地域社会的构成[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37-43.
- [21]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5.
- [22]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23]胡彬彬, 邓昶. 中国村落的起源与早期发展[J]. 求索, 2019(1):151-160.
- [24]何峰. 湘南汉族传统村落空间形态演变机制与适应性研究[D]. 湖南大学, 2012.
- [25]许广通, 何依, 殷楠, 等. 发生学视角下运河古村的空间解析及保护策略——以浙东运河段半浦古村为例[J]. 现代城市研究, 2018(7):77-85.
- [26]奚雪松, 孙淼, 许立言, 等. 发生学视角下传统村落的保护对象判别及保护发展策略——以浙江义乌何店村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19, 26(10):21-28.
- [27]龚胜生, 李孜沫, 胡娟, 等. 山西省古村落的空间分布与演化研究[J]. 地理科学, 2017, 37(3):416-425.
- [28]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 重庆市志: 第1卷(总述、大事记、地理志、人口志)[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2:773.
- [29]李禹阶. 重庆移民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179-186.
- [30]周勇. 重庆通史: 第1册[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4:80, 96.
- [31]李禹阶. 重庆移民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384-399.
- [32]重庆市志·经济地理志课题组. 重庆市志·经济地理志(1891-2005)[M].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350-351.
- [33]中国地方志集成编委会. 中国地方志集成·重庆府县志辑(第22册)·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卷19)[M]. 成都: 巴蜀书社, 2017:272.
- [34]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118-119.
- [35]重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重庆民族志[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2:27.
- [36]谢放. 清末民初四川农村商品经济与社会变迁[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0(4):71-80.
- [37]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吴寿彭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7.

[3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18.

[3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1.

[40]布迪厄.实践感[M].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73-82.

[4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4.

注释:

1 《华阳国志》卷十二《序志并士女目录》.

2 《字溪集》卷九《大宁监劝农文》.

3 康熙版《四川总志》卷十《贡赋》.

4 乾隆版《涪州志》卷五《风土志》.表1 重庆市传统村落类型与数量

5 由于各历史阶段中期的人口状况相对具有代表性,因此,各历史时期人口数选择为: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晋太康元年(280年)13万余人;隋唐五代时期:唐天宝年间18万余人;宋元时期: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9万余人;明时期:明万历六年(1578年)103万余人;清时期: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236万余人.数据源自: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重庆市志第一卷(总述、大事记、地理志、人口志)》,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73-774页.

6 《华阳国志》卷十二《序志并士女目录》.